

進步變成落後

JOHN REAR AND JOE ENGLAND REVISITED

無星

對於關心香港社會改革的知識份子，約翰·理亞 (JOHN REAR) 和祖·英格蘭 (JOE ENGLAND) 曾經是有力的批判者。祖的 HONG KONG-BRITAIN'S RESPONSIBILITY 和 CHINESE LABOUR UNDER BRITISH RULE，及約翰的 ONE BRAND OF POLITICS 和其它文章，都曾經對香港政府產生過一定的輿論壓力，廣泛為人所傳誦。

事隔數年，當約翰和祖再次踏足香港，來作為期一月（七月中至八月中）的香港問題研究。他們的重訪，雖然沒有帶來哄動，但也引起了不少研究香港問題的學者之關注。

在一次非正式的會晤中，約翰和祖聲稱此行不便公開發表任何意見，以免影響資料之搜集。他們士別數年，果然獲港府刮目相看，成為上賓，各部門首長充份合作，提供資料，連輔政司也親自面見。他們詳細的報告，將有待整理後出版。不過，在八月十五日，他們應港大亞洲研究中心之邀，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匯報，題為 "HONG KONG REVISITED: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透露了他們此行的初步看法。

約翰本人是一個大律師，曾任港大法律系的高級講師，HONG KONG LAW JOURNAL 的編輯，於五年前離開香港。他從英國來港後數月，便已開始撰寫文章要求香港進行政治改革。約翰所關心的課題主要為香港的政治憲法和勞工法例的改革。他曾經對香港政府通過的 PUBLIC ORDER ORDINANCE 大力抨擊，指其侵犯了香港市民的基本自由權利。

祖曾經是南威爾斯的工人教育協會的高級助教，負責教導學員進行對工會的研究。到港後，他出任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的 DEPUTY DIRECTOR，在七年前離開香

港回到英國。祖的兩部主要著作為前述之「香港：英國的責任」(HONG KONG: BRITAIN'S RESPONSIBILITY) 和「在英國統治下的中國勞工」(CHINESE LABOUR UNDER BRITISH RULE)。祖所探討的問題主要為香港的工業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

在過往的著作中，約翰以為香港政府並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政府官員並不是市民自己任命的。立法局實質上是由政府所操縱，政府任命的官守議員也只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並不能真正代表和反映民意。政府制訂各項政策之前，只作出有限度的意見諮詢，而往往忽略了低下階層的利益。政策的漏洞和施行的錯誤，投訴媒介的缺乏再加上香港的貧富懸殊，都造成只有富裕階級的利益才得到保障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祖著作中談到香港的勞資關係時，承接了約翰對香港政治架構的分析，指出了香港資方和勞方的懸殊力量。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家在勞資問題上組成強而有力的陣線（廠商會、工業聯會等等），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工會却積弱不振，不但會員人數少，而且亦不能有效地領導工人進行鬥爭，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勞工保障。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迅速發展，香港工人並未經歷過嚴重的失業情況。香港大部份工人都是受僱於小工廠，工人的流動性很大，組織工會以爭取合理待遇並不容易。資本家對中國可能收回香港的恐懼，造成他們只顧眼前的短期經濟利益，缺乏長遠的投資計劃。他們都不願對勞工福利等作出讓步。

香港的法例，禁止組織工會，工會以行業劃分，對力量的擴大影響不少。不過，政治上的分裂，更是工會運動積弱不振的重要原因，親國民黨和親北京的工會不但毫無合作

餘地，還不時互相傾軋。六七年暴動以前，港府最善於利用左右兩派的矛盾，互相拮抗，以限制工會運動的發展。左派工會的力量最強，但自從騷動以後，考慮到中國在香港的實際經濟利益（例如為數龐大的外匯），他們採取的政策基本上是保守和維護現狀的，福利主義代替了領導工人進行鬥爭的活動。工會的領導由工人業餘擔任，他們的文化程度低落，都是工會組織上的弱點。

中國暫時不會收回香港，香港人也不大願意回歸中國，祖和約翰便認為改良香港是現階段的唯一可行的出路。香港經濟上的發展成就非凡，社會改革和社會福利的增加，是必須實行的，而且絲毫不會成為任何累贅。既然資本與勞工的力量懸殊，大部份僱主都漠視員工應有的福利，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狀政府便責無旁貸了。政府可以通過勞工法例的訂立和修改，以保障工人的權益。但香港的政府沒有做到，儘管法例訂立了之後執不執行、如何執行是另外一個問題。

今次祖和約翰重訪香港所得的印象是，香港的勞資關係和政治架構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政治架構仍然是有利於資本家，而工會仍然不能發揮它們的功能。近年來最激烈的勞資糾紛，幾乎全部都是白領或政府工務員所組成的新興工會所領導。這些工會不受左派或右派的控制，本身有較大的獨立性，它們員工的流動性較少，有利於長期性的組織工作，更有力地爭取合理的待遇。不過這些工會的激進化，却並沒有擴散到其它生產行業、運輸業和服務業上。

在匯報中，祖指出香港政府在勞資關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基本上是中立和超然的。他說，研究世界上各國的工業關係，粗略可歸納為兩大類型，一為先進國家的 ANGLO-SAXON MODEL，二為發展中國家的 THIRD WORLD MODEL。在兩種 MODEL 中，政府都要和某一方的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或議會鬥爭，或民族解放運動。香港是例外，政府在處理糾紛時可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調停，仍可使雙方的談判得到一較合理的結果。香港大多數工會的政治取向都離開香港社會現實，左派工會以中國的利益為重，右派工會只考慮台灣的利益。香港的工會不能如第三世界的工會一樣，通過政治目標來廣泛團結羣眾。

如果我們接受了勞資力量對比不平衡這個事實，改革的動力便只可能是源於勞資雙方以外。中國、英國的壓力，和香港政府的主動改革便是唯一剩下來需要考慮的因素。

以左派工會一直以來的溫和政策（除了六七年受文革的影響外）顯示，中國所關心的只是香港的政治形勢和對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不會就勞資問題向香港的資本家或政府施加壓力。

英國方面對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能有效地迫使政府進行改革的說法，現在正廣泛流傳。但祖和約翰則認為這說法的流行，只可說是香港方面對英國情況的一種錯誤理解。英國只有絕少數的人關心香港問題，關心的人也缺乏認識和影響力。

知名度甚高的比利議員，認識和關心香港問題只是近年的事。起因是他的選區有不少新界移民，要爭取香港選民的選票，也連同要關心他們的故鄉的問題。學術界熟悉的 HONG KONG RESEARCH PROJECT，來來去去只得 WALTER EASEY 一人（前香港退休警官，東亞激進學者協會 AREAS 的成員）。其實，最有影響力是英國工聯會（T·U·C·）（社會改良主義的費邊社也要以 T·U·C· 為政治基礎），近年不斷公佈的香港調查報告和攻擊香港勞工情況惡劣的消息，都是英國工聯會直接促成的。事實上，英國任何一條法例，工聯會不點頭，根本是無法通過的。不過，祖和約翰倒承認，TUC 關心香港勞工問題的出發點是自私的，香港產品的入口已大大威脅英國工業（尤其是紡織品）的存亡，他們以為如果改善香港的勞工福利，增加工資，便可以削減香港出口英國貨品的競爭力。

既然英國和中國都不會在這些問題上向港府施加壓力，我們只能寄望香港政府進行主動的改革。祖和約翰今次重訪香港，發覺香港政府這幾年來在政策上有很多改善，七日有新假期、居者有其屋、九年免費教育等，都是政府主動提出，反映香港政府的政策日趨開明。他們認為這種改革，是源於一班新進和較開明的官員冒起，在一個開明的港督的領導和推動下，香港的法例已較為完善，勞資糾紛可以依法例辦理，使工人的利益獲得保障。政府已經認識到改革香港的重要性，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似乎是提點政府，指出那一方面還沒有改善，和指出政府政策在施行上的缺點。

如果我們說祖和約翰曾經是香港社會不平現狀的有力批判者，現在他們便是最盲目的樂觀主義者，與香港的現實日益遠離。他們觀點上的謬誤，除了是認識上的脫節之外，更有理論上的根源。



首先，他們的分析架構，採用了最傳統的自由主義的假定，政府並不代表任何階級和集團的利益，在處理勞資關係時可以採取客觀中立的態度。香港的勞資力量懸殊，開明的香港政府，可以幫助較弱的一方取得合理的權益。他們的理論是靜態的，無法合理解釋開明的政府出現的因素，只能准心籠統地歸立為個別官員的魄力和良知。

但在現實世界裏，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是維護大資本家和財團的利益的。美國總統的選舉，由財團的點金捧成，早已街知巷聞；即使在香港，看看政府所委任的非官守議員的名單，也會明白政府站在何方的立場。新興的改良主義報紙天天日報，也較祖和約翰看得深入，它的社論便指出新任的議員主要是代表商賈和銀行家的利益。當然，我們更要指出殖民地政府根本維護的就是英國政府和壟斷資本家的利益。

對香港現況的正確理論分析，只能是把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的改良政策，和香港的政治氣候與經濟結構的改變連系起來，才能認清政府推動改良運動的因由。

中國於七三年加入聯合國後，中英關係空前良好，香港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橋頭堡，中國和英國所關心的再也不是在香港的短期經濟利益。此外，香港的經濟結構亦有所改變，傳統生產的輕工業貨品，在面

對歐美市場對廉價產品的進口限制及東南亞國家的廉價勞工的競爭下，不得不轉為生產要求較高技術和質量的產品。要進行這種生產，就先得培養一班有一定知識水平的技術工人，九年免費教育的施行和大專教育（特別是工業教育）的擴展，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此外，香港慢慢變成東南亞的重要金融中心，亦同樣需要一羣商業和管理的人材。

要香港能長期安定繁榮，要維護中國和英國在港的長遠利益，要一羣「知識工人」不對現存制度不滿，破壞社會安寧，舊有的殖民地統治方法自然變得過時了。民政署和廉政專員公署的成立，勞工法例的制訂等，正是要宣洩羣眾的不滿，使一切不滿能依循「合法」的途徑去解決。

我們敢斷言，香港的民衆一日未能醒覺到其自身的權利，香港社會的不平也一日不能改變。對於只要求政府施與，機械地理解香港市民現時的心態，而不謀求改變他們的觀念的祖和約翰，將無法預見改變香港社會的真正動力。

祖和約翰重訪香港，驚嘆香港政府「進步」得多了，却不了解他們自己的落後。香港的問題必須和最後只能由香港人民解決，有良心的英國人，革命也好，改良也好，如果不從香港人民的角度出發，結果只能走向人民運動的反面，徒勞無功的。